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地区的圖書館事業概况

林 述

抗日战争时代的延安，是我国革命的圣地，是革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核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所在地。延安在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无论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做为党的宣传助手之一的图书馆事业，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早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延安市即有民众教育馆存在。同时中山图书馆亦于一九三七年五月成立，后又由边区教育厅成立了鲁迅图书馆。与此同时，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等单位也都设有图书馆。据现在所知的如：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边区医院等单位都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或资料室。在此以后，延安地区各地陆续成立的民众教育馆内，也都设有阅览室。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延安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是非常发达和普遍的。

延安市民众教育馆成立很早，但在一九三八年冬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曾一度停止工作。在一九三九年七月间，市政府又在新市场区开辟了一个新馆址，着手恢复工作。并号召广大群众捐赠书报支持他们的工作（註一）。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二日，延安市民众教育馆正式开幕了。这个民教馆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即：书报阅览室，出刊大众报，举行演讲会，代写处（代市民写信、写眼等），询问处（回答不识字与不了解的问题）。书报阅览工作在当时是工作中占重要地位的一项（註二）。

一九三九年三月边区文教厅为响应中共中央及毛主席关于学习的号召，在所订的教育计划中，也提到了“各县斟酌实际情形，成立民教馆或阅报室”（註三）。自此以后，各地的民众教育馆与阅报室、阅览室等却陆续地成立起来了。几年中先后成立的有庆环分区的曲子民教馆、神府民教馆、庆阳民教馆、镇清民教馆、甘泉民教馆、子长民教馆、鄜县民教馆、甘谷驿民教馆等。在这些民教馆中都设有阅览书报的地方，并且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

其中庆阳、曲子二民教馆因工作成绩优秀，在以后的文教会议中曾获得奖励（註四）。

除去民教馆中的阅览室以外，延安还有公共图书馆数所，如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绥德县的子洲图书馆等。现在就简单地概述一下这几个馆。

中山图书馆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工作开展得很好，对边区文化事业颇有贡献。一九三八年延安遭受了日机轰炸后，致使馆务曾一度停顿。一九三九年该馆留延安的理事，鉴于当时学习研究的需要，决定重新整顿恢复。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邀集了延安各界人士开会讨论如何整顿与扩大中山图书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一）使中山图书馆成为延安大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二）修正过去该馆的章程。（三）聘请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林彪、成仿吾、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思敬、邓颖超、孟庆树、李昌等十七位同志为中山图书馆理事，并推林伯渠同志兼任馆长，李昌同志为该馆主任。自此次会议以后，便着手进行整理书籍、建筑新馆址、募集图书等工作（註五）。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山图书馆又由馆长林伯渠同志召集了第二次理事会，在这次会议中周详地讨论了今后馆务进行的方针与步骤。并且为了适应馆务需要，又增聘了王林、乔木二同志为理事。并在理事中推举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王林、乔木五同志为常务理事，负责处理与领导馆务。馆主任改由乔木同志担任。

该馆在修建中即开始了工作，临时开放阅览。在修建完竣后，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正式开馆。

中山图书馆在组织机构上分为图书、材料、读者顾问、编刊等四部。当时馆址设在延安北门外大扁沟（註六）。

在藏书方面，据一九四〇年七月统计，该馆共有藏书五千余种，并收藏了当时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百余种。该馆拥有图书室、材料室、参考室、

閱報室、雜誌室等五個閱覽室。後又在一九四二年修建了一個新的書報閱覽室，並建立了卡片目錄。在外借手續上，開始時是憑各單位介紹信，並繳納保證金二元，由館方發給借書証借書，以一周為期。以後在一九四二年廢除了保證金制度，改用介紹信換証借書的辦法。該館的閱覽時間規定為每星期二至六下午，星期日整天開放，星期一休息（註七）。

除去閱覽工作以外，中山圖書館在其它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績。譬如，材料部在未正式開放以前，為了配合當時關於憲政問題的研究，搜集了各種有關資料，單辟一室供眾閱覽。並編印了“憲政論文選集”、“憲政論文索引”等，以滿足讀者的需要（註八）。以後並出版了時事資料、世界大事表、每月全國報紙雜誌論著索引等三種定期刊物（註九）。這種密切結合當前形勢為政治服務的精神，現在仍是我們圖書館工作者的典範。

魯迅圖書館創建於一九三九年以前。初建時規模較小，藏書不多。一九三九年冬季，邊區教育廳決定將該館擴大，以適應人民需要（註十）。但在擴大以後的初期，因為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問題，如書籍登記制度不清、無號碼、無分類等缺點，這就使得工作受到影響。為了改進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三月期間，該館專門整理圖書，不辦理外借手續。在此時期內還調整了組織機構（註十一）。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重新開放。此時該館已把原有的三個閱覽室改組為“圖書室”和“閱覽材料室”二個閱覽室。該館當時共有工作人員三人，劉耿同志為館主任，主持全館事務並兼理總務事項。其餘二人分別管理二個閱覽室。除去陳地閱覽工作（當時稱圖書出納）外，並且也開展了圖書外借工作（當時稱圖書流通）（註十二）。

這一次的調整，使得該館工作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根據一九四二年底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工作的開展情況。

圖書流通方面，一九四二年四月讀者不到二百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已增至六百八十四人。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十二月共借出圖書四千一百零四冊次。讀者成分是：邊區政府系統的讀者 323 人，占 35%；軍事系統的讀者 112 人，占 16%；中央系統的讀者 55 人，占 7.5%；學校系統的讀者 192 人，占 28%；文化團體的讀者 50 人，占 7.3%；商店的讀者 16 人，占 2.5%；工廠的讀者 15 人，占 2.2%；

其它讀者 7 人，占 1.5%。圖書數量方面：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十二月共增加藏書八百餘冊。其中包括：自然科學 195 冊；文藝類 159 冊；古書 140 冊；初級讀物 121 冊；社會科學 50 冊；語文 48 冊；總類 36 冊；教育 27 冊；史地 25 冊；哲學 12 冊（註十三）。

我們由以上的統計數字中，不僅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當時他們已經有了完備的圖書分類系統與讀者登記工作。在當時人手少事情多的情況下，能夠做出這樣的成績，我想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現在的圖書館工作者學習的。

綏德子洲圖書館原為綏德市第一圖書館，一九四二年為了紀念陝北共產黨創辦人李子洲同志，由政府委員會通過改名。一九四二年八月卅日正式將該館易名為子洲圖書館。為了紀念革命先烈，毛主席與朱總司令並親自為該館題寫匾額（註十四）。

除去這幾個較大的公共圖書館以外，也成立了一些專業圖書館。如一九三九年成立的邊區醫院圖書館（註十五）和衛生學校圖書館（註十六），一九四四年成立的延安中醫圖書館等（註十七）。此外，一九四四年在米脂還有農民自辦的農民圖書館出現（註十八），這實在是民辦圖書館的萌芽。

還應該提出的，是延安不僅有許多圖書館，而且還有它們自己的組織“延安市圖書館協會”。這個協會的成立日期以及具體情況，現在還不太清楚。但是，我們從它的二次會員大會的決議中，可以看到它在當時所起的重大作用。在一九四一年第一屆延安市圖書館協會會員大會上決定了二項工作：（一）調查延安各機關學校的圖書數目（約計十萬八千餘冊）；（二）了解各圖書館情況，幫助提高工作質量，並在分類編目上採用了統一的方法。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召開了第二屆會員大會。這次會議又提出了：（一）適當地分配新到圖書，（二）編延安圖書總錄，（三）出版會刊，（四）幫助各圖書館職員進行業務學習（教圖書館學），（五）選出高戈伍同志等七人為新理事（註十九）。

從這二次會議的決議中，我們可以看出延安各圖書館與各機關的協作精神，圖書館系統中的業務輔導與幹部培養工作，館與館之間的大協作與圖書調配情況，而且在這些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延安地區的圖書館事業，在艱苦環境中能夠有如此巨大的發展，我認為有這幾方面的原因：第一，黨和革命領袖的正確領導與關懷。黨不僅指出了圖

書館應該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而且还大力地支持了各地的建館工作，并派出党的負責同志具体参加圖書館的領導工作，保證了圖書館事业的正确发展与巩固。尤其使我們感动的是，我們敬爱的領袖毛主席对圖書館事业的深切关怀。毛主席在筹建边区医院圖書館、魯迅圖書館、中山圖書館等的时候还捐贈了款項（註二十），在一九三九年捐贈給魯迅圖書館的即有二百元之多（註二十一）。由此可見毛主席是如何重視圖書館事业的发展了。

第二，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持。当时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延安的条件很艰苦，圖書来源十分困难，但是全国各地人民却千方百計予以支持。如当时重庆、桂林等地的書店都捐贈了圖書給延安的圖書館。其中如中华書局一次就捐贈了“中国社会經济史”、“历代年表”、“鐵道年鑑”等書一百四十余种（註二十二）。

在延安本地区各机关的大协作，也是圖書館发展的原因之一。如边区医院圖書館成立时，中央干部教育部、后方政治部和馬列学院都曾捐贈了大批書籍。

第三，圖書館工作者的努力，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針政策，以及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也促进了延安各圖書館的工作。当时的圖書館工作，不仅仅局限在圖書閱覽、圖書出納与外借的范围内，它們实际上已經真正成为党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助手。譬如，它們密切地配合当时形势，編制时事資料、索引等来帮助大家学习政治。在鼓动工作上，他們也做得很出色，譬如在响应边区中央局提出的慰劳关中战士时，中山圖書館即捐贈了不少書籍雜誌（註二十三）。又如在三五九旅获得胜利后，它們也送去了大批書刊，来表达自己心意（註二十四）。这充分地証明了它們是在坚决貫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伟大原則。

除此以外，他們在帮助广大人民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大多数館都附設了文化补习夜校，帮助农民或文化水平較低的机关干部学习文化，从而在文化普及工作上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譬如，綏德子洲圖書館就曾附設了文化补习班，对象是机关工作人員中的文化水平較低的同志，每周授課六次，均在下午业余时间。課程內容包括國語、常識、音乐、算术，以及联系补习生的实际生活及工作等問題的教育。圖書館并且还負責解决學員的課本与筆記本（註二十五）。从这个例子中，

我們可以知道当时圖書館在文化普及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它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工作态度。

总之，抗战期間延安地区的圖書館事业是蓬勃开展的，它們的工作也是丰富多采的。在許多方面直到現在还是我們学习的榜样。可惜的是，我們今日对于这方面的材料还掌握得太少，不能够詳細而又系統地总結出寶貴的經驗来指导我們今天的实践。

后記：由于在科研工作中陸續地查到了一些材料，写成这篇东西。我的目的在于拋磚引玉，希望能引出更多更完善的有关材料，以弥补我国圖書館事业史在这方面的不足。我衷心地希望过去在延安地区搞过圖書館工作的同志，能回忆一下抽暇写出一些寶貴的史料。或者是知道苏区、老解放区圖書館事业情况的同志能够发表一些文章，使我們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材料来研究新中国圖書館事业的历史，总結前人的寶貴經驗，借以推进我們社会主义的圖書館事业。

註一：見 1939. 7. 28. 新中华报“市政府恢复民教館号召各界人士捐贈書報”。

註二：見 1939. 9. 26 及 1939. 10. 17 新中华报。“延市民教館新建館址加强民教工作”。“延市民教館正式開幕”。

註三：見 1939. 3. 13. 新中华报“边区教育厅三年教育計劃”。

註四：見 1944. 11. 20. 解放日报。

註五：見 1939. 12. 23. 新中华报。

註六：見 1940. 2. 28. 新中华报。

註七：見 1940. 7. 12. 新中华报。

註八：見 1940. 2. 28. 新中华报。“延安中山圖書館积极筹备中”。

註九：見 1941. 6. 1. 解放日报“中山圖書館規模扩大”。

註十：見 1939. 12. 6. 新中华报。

註十一：見 1942. 4. 25. 解放日报“关于魯迅圖書館的批評与答复”。

註十二：見 1942. 6. 6. 解放日报。“魯迅圖書館明天开放”。

註十三：見 1943. 2. 24. 解放日报“魯迅圖書館讀者增加”。

註十四：見 1942. 9. 11. 解放日报“紀念革命先烈綏德成立子洲圖書館”。

註十五：見 1939. 10. 24. 新中华报。

註十六：見 1940. 5. 31. 新中华报。

註十七：見 1944. 9. 7. 解放日报。

註十八：見 1944. 10. 25. 解放日报“米脂民丰区姜新庄成立农民圖書館”。

註十九：見 1942. 2. 11. 解放日报“延市圖書館协会召开二屆會員大会”。

註二十：見 1939. 10. 24. 新中华报“边区医院建立圖書館，毛泽东同志捐款百元”。及 1939. 12. 23. 新中华报。

註廿一：見 1939. 12. 6. 新中华报“教育厅扩大魯迅圖書館，毛泽东等同志捐五百元”。

註廿二：見 1942. 12. 2. 解放日报。

註廿三：見 1941. 4. 13. 新中华报。

註廿四：見 1940. 5. 17. 新中华报。

註廿五：見 1943. 6. 10. 解放日报“綏德子洲圖書館附設文化补习班”。